

# 城镇化背景下的赣闽边界村落变迁

——以岩岭、小姑村落群为样本的考察

刘善泳

江西石城、福建宁化均为客家的发祥地,在客家先民迁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岩岭、小姑是石城县的两个村落群,分别位于县境东北和东南,地处石城、宁化两县交界山区。前者含今高田镇岩岭、大秀、上柏、朱家、桂竹、堂下、礼地、黄柏等8个村小组,总面积90.79平方千米,除西部与本县高田镇相邻,东与宁化县河龙乡相邻,南与宁化县济村乡相邻,北与宁化县安远乡相邻。后者含今横江镇小姑、罗家、开坑、和平等4个村小组,总面积44.7平方千米,除西部与本县横江镇相邻,北与宁化县淮土乡相邻,东与宁化县方田乡相邻,南与宁化县治平乡相邻。这是赣闽边界极具特色的两个村落群,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加速演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它们从外在的自然形态到内在的社会和文化形态,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考察这一变化,可以为观察客家人当代迁徙提供一个样本,同时可从中窥视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边界乡村的命运。

## 一、交织与交流：“边界特区”的形成与维持

就像人们习惯以方言来区分本乡人和异乡人一样,在石城境内,“岩岭”“小姑”(为区别于同名村小组,后文均以加引号的“岩岭”和“小姑”分别指代两个村落群)区别于其他乡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近宁化而远石城的方言特质。石城方言和宁化方言都是客家方言。

前者属赣南客家方言,后者属闽西客家方言。特殊性在于,处于石城境内的“岩岭”“小姑”,所持方言却是宁化方言,正如《石城县志》所说,“县内各乡镇语言差别不大,唯边境地区受邻县口音影响较大,特别是岩岭、小姑两乡基本上属于闽西北宁化口音”。<sup>[1]</sup>其方言特质,整体体现在和石城方言差别较大的语音语调,也包括词汇、语法各个方面,本文仅以部分常见称谓名词为例。下面例举的是同于宁化而不同于石城的一些称谓词:“母亲”,石城称 woi,两地称 me;“祖母”,石城称“婆”,两地称“妈妈”;“外祖母”,石城称“外婆”,两地多称“婆婆”;“姑母”,石城称“姑姑”,两地称“姑姐”;“姐夫”,石城称“丈公”,两地或为“姐丈”或为“姑丈”;“女婿”,石城称“姑丈”,两地称“姐丈”;“花生”,石城称“落花生”或“花生”,两地多称“番豆”。

风俗和方言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两地风俗较多通于宁化。如在服饰传统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妇女刺绣裙兜儿和“盘龙髻”的妆扮。《宁化县志》记载:“(女性)有一种叫‘掩腹’的围裙,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配上‘腰链’和‘牙牌’‘手镯’等银饰,大姑娘梳长辮,小媳妇盘‘翘髻’,系罗帕,穿绣花鞋,形成了农村妇女的特色装扮。”<sup>[2]</sup>这种衣装,宁化有而石城无。

饮食传统方面,近于宁化远于石城的方面首先表现为多用大盘,菜肴汤水较多。“小姑”早期没有石城必备的宴菜“肉丸”。而两地普遍具备的宴菜“鱿鱼子猪肉”和“光饼”,宁化有而石城无。“岩岭”普遍具备的“麻

【作者简介】刘善泳,江西省石城县史志研究室主任。

糍”，宁化有而石城无。“小姑”吃酒席时中场可以离席休息，所以吃酒席的时间也较长，往往都要两个来小时，这一点也与相邻的宁化县淮土乡相似。

婚嫁习俗方面，“岩岭”“小姑”与石城最大的区别是女子出嫁“暗里投光”，即新娘选择夜晚出门，子夜后到达男方。而石城女子出嫁均选择早饭后出门，当日到达男方举行婚礼。另外，旧时石城和“岩岭”“小姑”都有新娘乘轿的习俗，但前者在1960年代后基本革除，后者则延续于改革开放之后。

居住传统方面，木屋建筑是两地别于石城中心地域的重要方面。木屋建筑是指完全以木材为原料构造的房屋，包括宗祠、住房及谷仓一类的功能性建筑，“岩岭”多称“椿凿屋”，“小姑”多称“水城屋”。住房通常为两层构造，部分区域住房下层即为牲畜栏舍，生活条件恶劣。两地还普遍有独特的“偷梁树”习俗，即新建房屋的厅堂主梁所用木材不在自家山场砍伐，也不从市场购买，而是去别人山上偷伐，如被发现，就付给对方双倍的价钱，还请其参加上梁宴席。

为什么“岩岭”“小姑”在石城县区域内，却形成了不同于石城反接近于宁化的方言和风俗特质，首先是因为早期居民多从宁化方面迁入，并逐渐形成聚落。以“小姑”为例。“小姑”所含4个村小组，小姑人口最多姓氏为朱姓，罗家、和平为刘姓，开坑为张姓。小姑朱姓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由今长汀县庵杰乡朱屋塘徙居马料磔（今罗家境），其后裔一支于明正德十年（1515）徙居小姑。庵杰乡紧邻宁化县治平乡，方言、风俗相近相通。罗家、和平刘姓则于明末清初从宁化淮土陆续迁入石城，小姑北坑里、溪子口、柳叶窝，和平石头岬、龚家村、李家边，罗家老屋场为其中数支。开坑张姓有数支，均从宁化迁入。明隆庆六年（1572）后，多支张姓陆续从宁化石壁、淮土等地迁入小姑、开坑等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张姓一支由宁化淮土梨树坑返迁马料磔，数支由宁化淮土陆续迁入开坑、罗家、和平等地；清顺治二年（1645），数支张姓由宁化济村湖头陆续迁入石城罗家、小姑、开坑等地；清乾隆年间，又有两支张姓由宁化淮土陂塘下先后徙居开坑兴高磔。

也就是说，“小姑”最早开发于南宋，明清时期村落群基本形成。“岩岭”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赘述。聚落基

本形成以后，较为封闭稳定的交际圈是巩固并维持这一特色区域的主要原因。通婚方面，改革开放以前，两地通婚圈基本在村落群内部及毗邻的宁化县数个乡村，通婚半径通常不超过20华里，并且绝大多数选择在同一“方言区”，因此，村落群内通婚占最大比例，其次便是相邻的宁化乡村。越接近宁化的，和宁化毗邻乡村的通婚比例越大。如和平村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男性，与宁化淮土等地的通婚比例高达70%以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婚姻方面的地域封闭性还有更为突出的表现，一是童养媳，二是“近亲转嫁”。在新中国成立前，土法接生，妇幼保健水平低，偏远乡村的婴儿存活率低，第一胎如果夭折，就要抱养个童养媳，称做“带头因子”，借此希望接着能够成功生养孩子。这个童养媳通常备做后面所生育儿子的媳妇。童养媳极为普遍，如小姑村的吉石自然村，1940年代前出生的男性，超过三分之一以童养媳为妻。所谓“近亲转嫁”，就是女性丧偶之后，不改嫁村外，而是续配于房族内字辈相同的单身男性，俗称“相窝子”。

集市交易（俗称“应圩”“赶圩”或“赴圩”）是乡村百姓最基本的经济交往活动，皆以就近原则处理。“岩岭”境内数度有圩市。清末，岩岭在下柏昌有简便圩市，主要服务于附近村民。1988年，因岩岭水库扩建移民，迁至长富开辟形成新的圩市。2001年岩岭乡和高田乡合并，圩市渐趋冷落，但仍为“岩岭”一带居民日常圩集，但“穰圩”的时间较短。1993年至1995年，礼地一度开辟边界贸易市场，吸引“岩岭”和石城、宁化周边居民。“小姑”历史上无圩市记载，1970年代末小姑始建街道，后两度兴市贸易，终因人口不多而未能成市。1990年代起，政府加大街道建设力度，边远山村部分村民迁居小姑街上，街区人口密度加大，逐渐形成圩市。2001年，小姑乡与横江乡合并后，圩市也渐趋冷落。20世纪80—90年代，在“岩岭”“小姑”单独设乡级行政区的时期，两地圩市较为兴旺，村民在本地圩集和就近宁化圩集间实行“双轨制”。

“岩岭”一带的“过穰”习俗也反映了石城、宁化边界民间往来之密切。“过穰”是“岩岭”和（宁化县）河龙、济村一带的民俗活动，形式近于庙会。各村坊“穰期”错落，互不冲突，有利于彼此往来。由于“亲串亲，邻串邻”，不但亲戚间借机走动，甚至邀伴引友同行，因此颇

为热闹。各村坊“过穰”时,除本村落群内部往来,石城、宁化边界村民互有走动,如大秀和河龙,桂竹与济村。石、宁毗邻乡村甚至还有供奉同一个神祇同期过穰的习俗。黄柏、礼地一带跟宁化县河龙乡明珠村同祀“尊王菩萨”,菩萨供奉于明珠村南坑庙内,每年正月初二组织队伍从南坑庙迎接“尊王菩萨”,然后轮流在黄柏的下庄、坳上、强丰、树坪、新村,礼地的湖家、长科、瑶下等村坊间活动,接受村民的供奉、拜揖,正月十一日接回流竹坑大礼堂,请戏班子唱戏酬神,十五日送回南坑庙。

正是密切频繁的交流往来甚至互为交织,使“岩岭”和“小姑”形成了与接壤的闽西边界相类相通的方言、习俗,成为赣地闽俗的一个独特地域,可谓石城境内的“边界特区”,并长时间以来得到维持。

## 二、流动与流连:大势所趋的人口外迁

改革开放后,封闭的社会形态逐渐打破,特别是公路条件改善,同时自行车逐渐普及之后,人们出行半径伸长,出行效率得到提高。1980年代,岩岭、小姑开通通往县城的班车,虽然班次较少,但开辟了沟通山乡内外的一个基本渠道。此时,极小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开始到就近圩镇买房定居或开店,还有部分公职人员因为工作关系移居圩镇甚至进城居住,他们成为最早一批离开家乡的人。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沿海新兴城市则出现大量劳动力需求,由此催生打工潮,两地年轻人和全县其他乡村的年轻人一样,陆续外出务工。之后,务工城市又扩展到全国各地。此时,摩托车兴起,并成为县内乡村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百姓的自主出行半径由之前的二三十里扩大至近百里。1990年代中期,石城县加快旧城改造步伐,并开辟建设了白莲城小区、陈家排小区等第一批商住小区,同时启动东城片区建设,工薪族和有些积蓄的乡村个体户越来越多选择在县城购房。“岩岭”和“小姑”也不例外。同时,两地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普通村民一部分到岩岭、小姑圩镇建房居住,个别村民选择在石城县城和宁化县城购房定居。他们成为第二拨离开家乡的人群。

2000年后,圩镇建设扩容,县城扩张,城镇化步伐

加快,就石城县而言,东城片区在2005后进入加速开发期,城市容量明显增大。此时,较为成功的第一代打工人在所在城市购房定居,或选择在其他城市落脚,扩招之后的大学生特别是一本以上的大学生,也选择了在大中城市就业乃至落户。还有相当一部分打工者回到家乡,在圩镇或县城买房。由于“岩岭”和“小姑”没有了乡镇一级行政区,村民基本不倾向在此买房,而所属的高田、横江圩镇似乎也没有很大吸引力,所以大部分直接选择在县城购房,要么暂时租住于县城。由此形成延续到2015年左右的第三拨进城的高峰,也是两地数量最多的一拨人口外流潮。由于地处边界,除了选择石城县城等地,“岩岭”和“小姑”的一部分外迁户,选择了迁往宁化县城,数量甚至多于迁往石城,如开坑村外迁宁化的人口便超过石城县城。

其实,“岩岭”和“小姑”这样的边界乡村人口外迁已经是全国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共同问题,既有水到渠成的自然流动,也有读书、就医难以为继等现实促成。这里补充叙述一种情况,就是相关政策有意无意的助推。如在1986—1990年的岩岭电站续建过程中,岩岭村所属下罗、杜家、水口、罗坑等村小组被水库淹没,库区政策性移民126户703人。又如2016—2018年,“岩岭”“小姑”共56户贫困户262人享受扶贫政策搬迁至“进城进园”,先后入住县城铜锣湾小区,其中“岩岭”31户146人,“小姑”25户116人。应当说,这些贫困户靠自身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进城梦想,精准扶贫的政策“加持”为他们打开了通道。

不过,这种大势所趋的流动不管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并非毅然决然,也伴随着犹豫、流连和回望。从政策层面上看,石城县2004年起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鼓励村民拆旧建新,2012年又启动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统筹进行。全县所有乡村几乎都经历了新的建设,绝大部分村民都新建了住房。“老家要留点屋宇”是石城人民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和危旧土坯房改造当中,大部分外迁户只要在当地还有户口的(意味着建房资格)基本上都在老家新建了房子。客家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村民住房升级换代的自身愿望,加上政府对农村住房改造的鼓励推动,使“城镇化”至少在住房这一端显得有些犹疑。相当一部分村民在“进城”的过

程中,一段时间内存续了与老家若即若离的状态,或者经历了并非一次到位的过渡。以家庭为单位观察,有的年轻一代在外创业定居或迁居县城,但是老人留在老家养老;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年轻人在外定居,同时在县城购房供老人居住;有的为了孩子读书全家租住在县城,劳动力就近务工;有的年轻人在县城购房,并就近务工,兼顾孩子读书,中老年人则仍在家种田,分担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有的家庭年轻夫妇一人带着孩子租住于县城,一人在外务工,父母则留在老家。

其实,在当前,即便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了“城镇化”,但村民和老家的联络并未完全中断。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村民老家还有房子,也还算是老家人;另一方面,每年还有一些例行的活动是必定要参加的,如春节期间回乡拜祖、拜年,清明的祭祖,还有一年一度的“过穰”及与老家人的日常往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土坯房改造当中,大部分村坊以房族为单位重建了不同层级的祖堂(宗祠)。近几年,一些当时没有修建的,也大部分筹资维修或新建,有的宗祠大修之时还进行了族谱的修纂。不管是对祖先的拜祭、过穰的聚集、族谱的修纂还是人情的往来,都是对曾经村落的一次重拼,虽然拼图越来越觉勉强,但依然还在延续。

### 三、渐变与突变:文化生态的崩析

“岩岭”“小姑”改革开放后的这次人口大变动,是两地人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一次新迁徙,其动因和形式跟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迁徙都不一样。在城镇化率必然进一步提高,短时间内城乡资源分配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乡村的萎缩显得难以避免。如以现在趋势来看,等乡村留守老人陆续退场后,“岩岭”“小姑”这样的山区边缘乡村可能面临彻底的空心化,村落面临局部甚至全部的消失。在此大变动的当口,笔者想简略梳理这两个“边界特区”在方言、风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为边界村落文化生态方面做一个麻雀解剖。

事实上,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随着交流、交往空间的扩大,在两地人口还基本稳定的时候,风俗就不知不觉发生变化。比如,“岩岭”新婚闹洞房除了猜拳行令,还有“搞新娘”的习俗,就是宾客可以适度调笑新娘,但有些宾客行为粗野、出格,场面可谓不堪。20世

纪80—90年代随着乡村封闭被打破,此俗逐渐趋于文明,直至完全革除。服饰方面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长大的孩子,婴幼儿时期或许还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佩戴祈福辟邪的饰物,但进入学龄之后,着装基本都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因此,前述穿刺绣裙兜儿、挽“盘龙髻”的妇女特色妆扮,1970年代后出生的女性基本与之无缘。

饮食方面也一样,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菜肴趋于精细,比较粗糙的“光饼”一类菜肴逐渐不受欢迎,自然而然淡出于酒席。另一方面,随着彼此交往的增多,石城中心区域相对强势的饮食传统影响着边界。以石城头号宴菜“肉丸”在小姑村吉石小组的传播为例。吉石小组和两地其他地方一样,传统酒席原本没有“肉丸”,1960年代末期,当时在横江乡工作的一个吉石人置办了第一个加工肉丸的石臼(俗称“料钵子”或“料白子”)。在此稍前几年,“肉丸”刚进入吉石村,不过使用的加工工具是比“料钵子”大得多的原本用来打黄糍的“斋臼”——“斋臼”到“料钵子”的过渡,是饮食习俗过渡的物证。现在,“小姑”已和石城其他地方一样,肉丸已经成为基本宴菜之一。

居住传统的改变,主要缘于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椿凿屋”逐渐被“土墙屋”所取代,20世纪60—70年代后,就没有村民新建“椿凿屋”了。1990年代后,“土墙屋”又逐渐转向“砖墙屋”,闲置的“椿凿屋”渐归老朽。新农村建设的拆旧建新,“椿凿屋”加速消亡,土坯房也迅速减少。危旧土坯房改造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进程,时至今日,“椿凿屋”已经成为稀有之物,“土墙屋”也难得一见了。

婚俗的改变也是如此。随着外向型交往的增多,特别是与“不同俗”的其他地域出现风俗冲突时,只能选择变通与适从。1990年代后随着外出人口增大,婚姻完全跨出了之前的圈子,风俗必然随之改变。可以想象,假如和一个千里之遥的外省人通婚,即便还想“暗里投光”也根本无法“操作”。

风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生活习惯,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风俗,形成于漫长的农耕社会,也正是农耕社会的稳定特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风俗。随着社会节奏和社会变动的加快,习俗的改变随之加快。过穰“会期”的变化颇能说明问题。岩岭村以菩萨为中心的“过

穰”，旧期在八月初一至十五日。1960年代“破四旧”，菩萨被废，过穰习俗中止。改革开放后重兴，但没有重塑菩萨，于是不再有之前的行像环节。1980年代岩岭水库扩容建设，岩岭村下罗、土家、水口等地居民分散迁出，过穰活动又随之而废。2000年，好事者再度组织复兴，考虑到八月尚处农忙，并且村民多在外地务工，遂将会期改在正月。

方言的变化有不同于风俗的特点。首先，这两个边界方言特区内部并非完全一致，比如前面提到的称谓词，妇女，两地通常称“妇娘”，但桂竹、堂下、小姑和石城中心地域一样称“婆太人”；柴火，两地通常称“樵”，而桂竹、堂下与石城一样称“柴”；花生，两地通常称“番豆”，桂竹、堂下与石城一样称“花生”。这种不同，无疑与早期的人口流动和交往多有关联，难以尽溯。在近数十年人口大变动的这个时段中，方言变化中3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是趋中心化。在改革开放封闭被打破，人口还未变动时，两地的方言就由于交流圈子的变化而所变化，如2001年小姑乡和横江镇合并之后，“小姑”和横江的交流明显增多，方言变化向横江倾斜。基于同样的规律，“岩岭”“小姑”两地方言都有缓慢向石城方言靠近的趋势。二是两栖性。两地人民在区域内自然是使用原方言进行交流。相当一部分群体，在本区域外和石城人交流时，改用就近圩镇所在地的方言，即“岩岭”人通常使用“高田声”，“小姑”人通常使用“横江声”。三是混杂化。由于个人交往圈子的错杂，加上方言转换通常难以完全到位，造就了夹杂

数种方言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混杂话”，如在石城县城的小姑人多使用带有小姑、横江、县城方言甚至普通话成份的混杂话。这种混杂不但表现为个体，甚至表现在家庭内部的交流，比如由原“小姑”迁入石城县城的家庭，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出现家庭内使用数种不同混杂话进行交流的情况。以上所述情形，反映的是语言变化中的过渡，最终结果是，随着人口大部分外迁，两地原方言的使用人群将越来越少。仍以家庭为例，外迁家庭中未成年这一代，基本抛弃父辈的方言，或使用普通话，或入乡随俗使用了居住地的方言。可以想见，随着代际更新，以家庭为单位的外迁户原使用方言终将消失。

近年来，边界研究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成果也越来越多。近数十年来，“岩岭”“小姑”这样的边界乡村，在工业化、城镇化大潮的冲刷下显得岌岌可危，独特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改变，方言、风俗等文化基因在人口的发散性迁徙中逐渐消弥。显然，这两个极具特色的“边界特区”，不管是对于学界，还是对于交界的两县，都需要进一步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潘舒

###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石城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石城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05页。

[2]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8页。

## 抚州市启动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

6月14日，抚州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启动会暨业务培训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谭贛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锋出席会议；市地方志办主任平六根出席会议并作编纂工作说明。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哲主持。

为保证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提升编纂水平，启动大会后，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陈志平作题为《方志基本知识及“两志”编纂》的业务培训。为便于各承编单位开展工作，会上向与会人员分发了由市地方志办编印的《抚州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实务手册》。

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责任单位分管领导、编写人员，广昌、乐安县委宣传部分管负责同志及乡村振兴局、地方志办主要负责人，市地方志办全体人员，“两志”总纂室成员共180余人参加会议。

（抚州市地方志办）